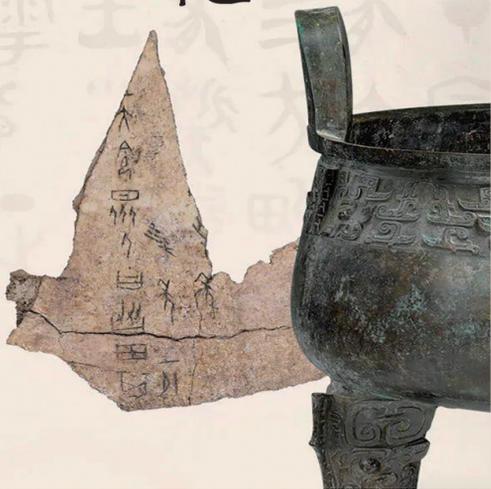




国家记忆

□ 扎兰·成吉思



华夏文明之河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流淌至今,国家博物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和沧桑变迁。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其馆藏数量之多达143万余件,其种类林林总总,琳琅满目,浩如烟海,贯穿古今,异彩纷呈,具有高度的权威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真实而充分地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血脉绵延和古今赓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民族骨气、民族特质。

中国国家博物馆到2024年已经创建112周年,国博考古也走过了百余年的春夏秋冬、风雨历程。1921年,几乎与仰韶遗址发掘同时,在河北鹿鹿(今巨鹿)开始的古城发掘,揭开了国博考古的序幕,掀开了探踪索隐、钩深致远的华章。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如沐春风,蓬勃发展。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开拓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并设立专门机构,开一时风气之先,不断而执着地从陆地、海洋和空间不同维度找寻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探索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历史渊源、成长轨迹及其路径。

千问万问,苦思冥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怎样走来的?”让考古来回答。考古就是根据古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研究古代历史。根据发掘出来的或古代留传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就形成了考古学。考古,手握“洛阳铲”,穿越时空,千辛万苦,是在用少量的信息,分析大量的结论,从而考证和回答历史之谜,人类之惑。

当我们虔诚地仰望和凝视那神秘悠远的古代城址、波澜壮阔的长城关隘、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气势磅礴的帝王陵墓、灿若星辰的宫观寺庙、瑰丽奇妙的石窟崖刻以及丰富纷繁的文物宝藏时,我们除了流连忘返、叹为观止、惊羡敬佩之外,应该更多地思考并践行如何传承发扬人类的智慧与文明。

文物文献,是国家记忆,是不可再生的国之珍宝,其所宣示和折射出的是人类文明的恒久魅力。“岁月给了你凝厚的积淀,镌刻着余晖下的铁马金戈,也盛开着那永不凋谢的花蕾。”让我们的骨子里,千秋万代浸染你的感慨和血脉,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永远继续国家记忆。

唐山文化有奖问答 邀您参加!

本报讯(记者赵岩)唐山陶瓷被誉为中国的什么?唐山解放是在什么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你都知道吗?参与答题的朋友您将有获得精美文创礼品一份!

为宣传普及唐山历史文化,加强文化传承,增强文化自信,唐山劳动日报社与唐山文旅集团联合推出有奖答题活动。热爱唐山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快来用微信扫码答题吧!即日起,每日9:30—21:30可答题,全部答对有机会获得兑换码(每日有限额)。凭手机兑换码于当日10:00—22:00到南湖丹凤朝阳广场印象唐山文创店可领取文创礼品一份。

参与活动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



1995年,新华社文教记者贾靖宏将家传和收藏的二百多幅书画珍品捐赠给家乡人民,唐山博物馆设馆陈列。1996年,唐山举办纪念抗震20周年书画展,他又四处奔走,多方联系,诚请全国书画名家为展览构思了一批上乘之作。在操持捐赠和展览,及此后书画活动中,笔者与贾靖宏多有接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有幸聆听他讲述书画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名人趣事。

情系两代人

贾靖宏祖父贾树源为清末秀才,父亲贾树轩是京津唐和关外颇有名气的书法家。20世纪40年代,贾树轩由至交张伯驹陪同去颐和园拜会张大千。经张伯驹推介,贾树轩购得张大千《高士闲咏图》。1966年,老人洞悉时势,命孙子连夜坐火车赶往北京,将此画送到贾靖宏手中。

《高士闲咏图》虽为临摹敦煌壁画,但不留痕迹,臻于化境,左上角长跋令作品更显浑厚凝重。此作曾于1983年10月入选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张大千遗作展”。20世纪70年代,贾树轩弥留之际握着贾靖宏的手说:“那幅画可要保护好,你不可因生活困难而把它折腾出去呀!否则,我和你恩师伯驹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不会饶恕你的。”贾靖宏将此画捐赠后深情地说:“如果父亲在天有知,他会同意我这样做的。”

邻居“牛模特”

贾靖宏曾两次采访李可染,聆听他关于“以牛为邻”的故事。李可染曾在《自述》中写道:“1942年,我们住在重庆金刚坡下的农民家里,住房紧邻着牛棚,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它夜间蹄声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觉得牛不仅有辛勤耐劳的品质,形象也着实可爱。”

于是我以邻居的牛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从此,牛画便成为他的一绝。

1987年,李可染将《梅下牧牛图》赠给贾靖宏。画面上憨态可掬的水牛悠闲自得地前行,牛背上稚气的牧童背着斗笠,身着短衣短裤,仰望着绽放的梅花,使读者仿佛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春风。左上角题曰:“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靖宏同志属属,可染于师牛堂,时丁卯”。作品简练、超拔、透脱,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上品。

书赠钓鱼台

1983年夏,刘海粟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作了巨制《曙光普照神州》,8月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刘海粟画展》。由于地域关系和宣传不够,参观的人较少。

8月26日,贾靖宏在一篇新华社稿中称:“八十八岁高龄的艺术大师刘海粟用了整整一夏,以酣畅的笔墨、艳丽的色彩,为钓鱼台国宾馆创作完成了巨幅国画《曙光普照神州》。国务院时任领导到钓鱼台看望了海粟老人,连连称赞他的画很有气魄。27日的全国各大报刊转载了这篇稿,一时《刘海粟画展》便由“门可罗雀”转为“观众盈门”。

为了表达谢意,海老约贾靖宏来钓鱼台国宾馆一叙。一见面,便拉住贾靖宏的手说:“靖宏同志,感谢你呀,你的报道让全国都知道了。”并当场挥毫,书赠杜甫诗句书法一幅。

无“女”不成梅

关山月一生为人民大会堂绘制过3幅大型国画,即与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广东厅的《春到南粤》和梅花图《国香赞》。

说到《国香赞》,当年领导嘱关山月画山水,但他考虑前两幅都是山水,再画内容和构图容易重复,经请示后改画梅花。对此,关山月解释道:“古诗云‘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

书画背后的名人趣事

□ 刘士裕

坚’,梅花历来为人们所尊崇。人民大会堂有一幅梅花图,是很合适的。”

1987年3月30日,贾靖宏采访关山月。关老在谈到艺术的源流时说:“生活是源,传统是流,古人云‘无女’不成梅,因为梅枝成90度角相互穿插,很像‘女’字形,这是从写生中总结出来的。”

临别时,关老即兴作《铁骨梅花》相赠。此幅画作一枝老梅横斜直上,恣肆急速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内心激荡的豪情,令人神往。

“旱鸭子”谈画

1985年盛夏,贾靖宏在北戴河避暑,与吴作人不期而遇,时常一起在海边散步。

吴老不会游泳,戏称自己是“旱鸭子”。谈到游泳,吴老很自然地同绘画联系起来。“游泳是一门技能高超的艺术,要下苦功才能练好。”他说:“一个画家一定要像游泳运动员那样执着认真地对待创作。画家不但要熟悉传统,还要像运动健将那样,能钻进去又能冒出来,‘钻进去’就是学习传统,‘冒出来’就是创新。只有创新,绘画艺术才会有生命力。”

1986年初的一天,吴作人约贾靖宏到他的寓所,告知他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吴作人画展》。贾靖宏及时、有效地对此进行了报道。画展结束后,吴老高兴地将1984年创作的金鱼图《自由自在》相赠,令贾靖宏终生难忘。

“八千岁”送字

1983年一个星期日下午,贾靖宏应着敲门声打开房门那一刻惊呆了:“溥老……怎么,是您……”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门外站着的分明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

贾靖宏忙把老人请进门,溥老坐定,便高声说道:“今天得空想出来走走。这不,我把给《半月谈》的题字带来了,省得你去取。”潇洒秀美的书法令贾靖宏

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向溥老深深地鞠了一躬。此时,左邻右舍听说他家来了“八千岁”,十几平方米房间很快挤满了人。

然而,更令贾靖宏先生惊喜的是,溥老同时也给他带来一幅行书立轴,内容为访京西樱桃沟曹雪芹故居口占一绝。这让已深为感激的贾靖宏更不好意思了,一再说:“您是人大常委,又是民委领导,出门何必去挤公共汽车呢!”溥老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只有少给国家增加负担,心里才踏实。”诚挚肺腑之言,令在场的人十分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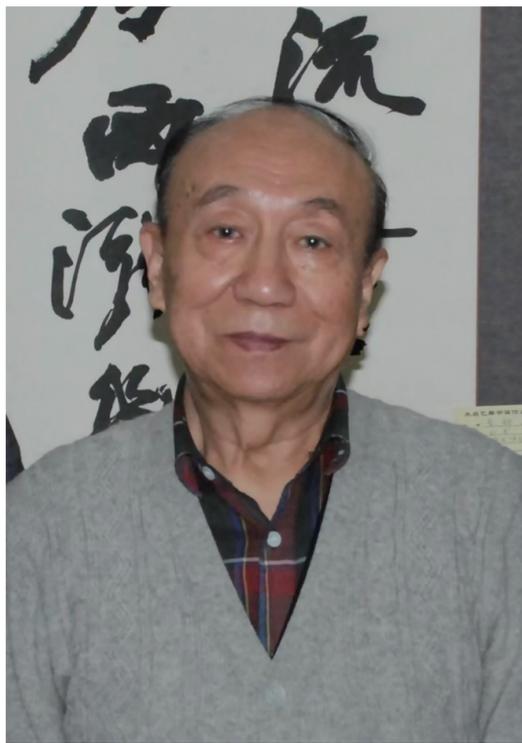
义卖赈灾区

在贾靖宏捐赠作品展后,当读者看到吴冠中作品《江南小景》时,自然会联想到一次义卖

活动。

1991年7月21日,吴冠中在电话中委托贾靖宏将1986年创作的《老墙》义卖,所得钱款全部捐赠给洪涝灾区。在得到领导支持后,22日,贾靖宏便去吴冠中寓所写新闻稿。新华社将消息发出后,国内外十多位收藏家有意收购,其中香港企业家李达杨称画款将很快汇到北京。为了尽快将画款及时送到灾区人民手中,贾靖宏同相关方面及吴冠中协商,以50万港元卖给了李达杨。

8月7日,“吴冠中赈灾捐款新闻发布会”在新华社新闻大厅举行。吴冠中动情地说:“作为一名画家,我只能用画作表达对灾区同胞的一片情义。义卖的圆满成功,也有着贾靖宏先生的辛劳与汗水。”



贾靖宏先生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7)

□ 王烁辉

(接上期)

4. 辗转战斗在 长城线上“无人区”

日伪第四次、第五次“治强”期间,对冀东实行分割封锁,在沟壕如网、碉堡如林的形势下,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困难重重。

1942年4月下旬至5月底,冀东八路军主力突破长城沿线的封锁线,进入关外的热南地区。

热南,泛指热河省的锦承路以南地区,包括兴隆、青龙两县全境,滦平东部和承德、平泉、凌源等县的南部地区。南界长城与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相联,西经平北游击根据地与平西根据地相通,东可伸向伪满洲国腹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热南即被日本侵略者视为重要地带,建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

其实,自1940年春起,冀东区党分委便开始跨长城内外,深入热辽部分地区、宣传、组织、发动抗日群众,逐步开辟出青龙、平泉、承德等10个县的地方先后组建过12个区政权,还有4个联合县抗日政权。

随着冀东抗日基本区的鲁家峪、腰带山根据地相继被敌人占领,冀东部队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相继陆续转移到热南地区的王厂沟(喜峰口关

外,今属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五指山等几块分散的山区坚持斗争。中共冀东地委机关曾设在八区的羊羔峪、天桥峪、马架沟和九区黑河川一带;专署设在十二区驴儿叫北山;军分区司令部设在马架沟村的杨树沟,军分区供给处设在八区的窟窿石大北岔;军分区卫生部设在大马架沟……

新开辟的游击区军民抗日烈火越烧越旺,敌后工作环境也相对比较稳定,这给根据地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本地群众和党员干部的保护与隐蔽下,冀东主力部队初到的前两个月左右,未与敌人产生正面冲突,较好且迅速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冀东的形势却在1942年初秋再次开始紧张起来。

由于在之前冀东抗日军民进行的反“扫荡”战役中,日军连连遭到挫败,在冀东的第四次“治强”目的远未达到。日军将冀东地区提到极高的战略地位,决定将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缩小规模,而集中重兵并从山东、冀中等地和关东军中抽调一部兵力到冀东,在华北方面军直接指挥下,对冀东进行大“扫荡”,即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随着日伪军企图搞第五次“治安强化”大“扫荡”的情报陆续传来,根据上一次反“扫荡”的经验,为了不使报纸出版工作再次中断,中共冀东区分委和报社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

届时采取远距离转移方式,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将《救国报》也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关外去办。

按照这一设想,崔林先派出4位同志,北出长城,踏进深山,熟悉地形,联系群众,物色新的活动基地,最终选定关外的河南大峪(今属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和周边一带作为转移地点。这一带,此时属于敌人卵翼下的“满洲国”范围内,也是敌人心目中的所谓“治安区”。敌人当时的侵华兵力不足,对于这一带暂无暇顾及。加之,驻扎在关外的敌人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而关内敌人则为日本华北方面军与伪“治安团”,这些敌军分属两个指挥系统,行动上不能完全统一。因此,局势相对比较稳定。

报社同志们为反“扫荡”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印刷物资的运送、报纸发行的线路等,都做了必要的安排,由各村堡垒户作为联络点和交通站,各点联结起来就成为看不见、抓不到的“地下运输线”。

1942年9月,日伪集结兵力5万余人,开始大举“扫荡”。这次大“扫荡”自9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与五次“治强”同步进行,施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一举摧毁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早有准备的《救国报》社同志们迅速走出长城。转移到关外的同志们,目睹了在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境况,看到那里的老百姓在日寇、特务、军警的残酷压榨下,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境。同志们眼含热泪,将随身携带仅有的一两件单衣,甚至把自己身上穿着的衬衣脱下来,捐助给受苦受难的抗日群众,仍觉得这与群众对自己的帮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一经党的教育和领导,立即迸发出抗日的怒火。他们站岗、放哨、送军粮、参军、支前,在“满洲国”的一些地区,形成了抗日的热潮。

此情此景,更加激发了《救国报》同仁救国救民的热情,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他们提笔撰文,记录着敌占区人民的苦难与坚强,深情抒写百姓对党和军队的拥护与无私帮助。

《救国报》的同志们记录下当地百姓的艰难,却没有描述自己当时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办报的。多年后,我们从知情人的笔下见到了当时的场景——1943年春被分配到尖兵剧社的卜雨同志回忆起他初到热南地区时所见:茅草搭成两个草棚,一个是司令部,一个是政治部。棚内有好几堆石头,一个大石头旁放几个小石头,这就是各科办公的地方。山沟里,炊事员用石头架起行军锅做小米干饭。饭菜熟了,没有碗筷,就摘下榛子叶当碗,折个树枝当筷子……

(待续)